

#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张广智 张广勇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广智 张广勇 著

# 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张广智,张广勇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ISBN 7-80681-197-4

I. 史... II. ①张... ②张...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641 号

###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作 者:张广智 张广勇

责任编辑:顾 村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6.25

插 页:2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200

---

ISBN 7-80681-197-4/K·044 定价:41.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这一书名，只要稍知一点中国新时期的学术文化发展史，便可察觉那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产物。的确是这样，拙著最初是作为周谷城、田汝康先生主编《世界文化丛书》之一种出版的，不免沾了我的两位老师的光，后来这套丛书荣获了中国图书奖，这本小书也由此沾了同道的光，被屡屡重印，学界流传甚广。1992年还在台湾由淑馨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

如今，新世纪的大幕已经拉开。当人们在回眸昔时那场文化讨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潮退后的短暂沉寂，留给我们的还是几多遐想，几多思考。

说真的，现在回想起那时写作这本书时的艰辛，心里还是感到发怵。那是因为，西方史学的艰涩，文化定义的游移，更在于国门开启后，对西学的迷蒙，而研究客体又在时间长河中不断的变异……

这是事实。拙作所叙述的对象大致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从那时以来，西方史学自身的变化以及西方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令人瞩目，如同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已经探索了新的地带和新的战略”<sup>①</sup>。

二战后，西方史学确在快步发展，这种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生了又一次新的转折（拙书称作西方史学史上的第五次转折，见第339页），由此开创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这是西方新史学发展、

繁荣而又式微、变异的时代。当代西方新史学,在70年代以前,可谓是凯歌行进与踌躇满志,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对于这场“革命”的进程,亦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新史学,更进一步说,对自古希腊迄今(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本书是有陈述的,但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情况,自然在我们落笔时还不能涉及。对此,当然不是拙书所能承担的,需另书专论。但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本书,使之知所因承,故在此,就它的一般发展趋势补白几句。当然,这种归纳或概括,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方面,因而,难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显示出各自的个性。

从国际史学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不复存在(当然它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这之后俄国史学的发展变化就颇令人关注,这一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国际(或西方)史学的格局发生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会泯灭,在西方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大有人在,更不必说日益发展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了。

我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潮”指的是后现代主义。不管我国学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如何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后现代转向”的提出,它在知识领域的影响不可忽视<sup>②</sup>。倘若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以“后现代性”来对抗“现代性”,显示对过去的摈弃或遗忘,那断然是不确切的。现代性不会戛然而止,因而现代性的主要标识也不会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史学景观在70年代以前是不曾出现过的,此其一。

从西方主要国家的史学发展的变化来看。西方新史学在70年代以来的变化,蔓延欧美各国,这里略举一二。

以法国为例。二战后年鉴学派曾在法国史坛一枝独秀，但在70年代以后，风光不再，昔日历史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垄断”地位亦不复存在，法国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如表象史、记忆史与微观史等成为“新宠”与时髦，而政治史的复归成为晚近以来法国新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最重要的新趋势<sup>③</sup>。

以美国为例，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方纳在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时，这样评价过去30年里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所发生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社会史学（有时也称为新社会史学）的全面崛起，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史学而成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心内容。”<sup>④</sup>在访谈中，方纳还就社会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它对美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引起的新变化，作了更详尽的论述，在此不赘。

由以上法美近30年史学的新变化，或可略窥7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的轨迹，此其二。

从历史学自身的新陈代谢来看。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从这一视角来观察近30年西方新史学，也许更能切合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这里，毋需我多饶舌，伊格尔斯用几个“转移”，大体已能高屋建瓴地归纳出这种变化。他指出：

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

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现实的方面，

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

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sup>⑤</sup>

伊格尔斯所说的这几个方面，不就是从某个侧面反映他所说的过去30年中历史学家所探索的“新地带和新战略”吗？此其三。

面对这种种新变化,就笔者个人陋见,我以为 70 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化,仍然是西方新史学的新发展,从目前看来,它离开一种新的史学范型的建立,似乎尚有一段距离。当然,这种发展包含着前进中的曲折,变革中的继承,创新中的回归,显示了史学自身运动的多变与反复,这归之于时代的演变,更归之于西方史学自身的新陈代谢。

## 二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这一书名所示,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史学史。史学史,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它应该如何写作,似无定规。周谷城先生在说及世界文化史写作的困难时这样说道:“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sup>⑥</sup>

周氏所言,颇能契合他历来所说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历史写作理念,是为了使写出来的著作能“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同样,就西方史学史的写作而言,也不应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仅就编纂的具体方法来说,通常有如下三种写法:

一是按时间顺序,沿着西方史学由古迄今的历史轨迹,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的史学发展历程。如现已出版的一些《西方史学史》,就是这样。这种写法的最大优点是,一册在手,读者便可略知西方史学史的来龙去脉与新陈代谢,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总体印象。这种体例,通常用来写作教科书更为合适,因为教科书往往是为初学者指

出治学门径的。当然,学术专著也可以这样写,如汤普逊的名著《历史著作史》便是按时间顺序来写的范例。在此,顺便说一句,《历史著作史》也是可以用作教材的。

二是按西方史学史的内容,如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历史学派、编纂方法等分成若干个专题,独立成章,合则为一整体,通读亦可知西方史学史的发展理路。选择哪些专题呢?似乎也没有固定的陈规,或可以由写作者“易于着笔”入手。

我把前述第一种方法称之为“纵向式写法”,第二种写法称之为“横向式写法”,这第三种写法便是“纵横交错法”,我以为现代英国史学史家乔治·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便是这种写法的经典之作。它的分国叙述与专题介绍似为“横向式”,而每个国别或专题部分的写法,又是“纵向式”的,纵横结合,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堪称史学史写作,尤其是新代史学史(如19世纪的历史学)写作的楷模,当然是令我辈歆羡不已的了。本书也是采用此法,意图是通过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使读者可以多层次多方面地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也许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了。

的确,历史写作方法自不必拘泥于一种程式,为“易于着笔”,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独创性,管它是哪一种方法,都可“拿来”,为我所用。由此,我联想到了叙史方式变化的问题,即如何讲述历史、文化的方式问题。前面所说,即是通常所说的“编纂体例”,而这里所要讨论的则是表现手法,即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叙史方式”),推而广之,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

例如,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就很有讲究,大则关系到实现历史学自身的价值问题,小则直接影响到“销路”,倘若读者在那些“高头讲章”与“深奥艰涩”的作品面前望而却步,“著书皆为稻粱谋”还从何谈起,看来这“小”还是“大”。

为了写作本书,为了把艰涩深奥的内容,杂沓繁衍的思想,磨练得平易可感,让克丽奥女神(Clio,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不再一脸严肃,不再装腔作势,变得亲和近人,坦白地说,我们是为之颇费心力的。食洋不化就会装腔作势,囫圇吞枣势必诘屈聱牙。对于西学,对于西方史学,对于西方史学新说,我们以为,重要的是要自己弄懂,而不要急于去批判。只有自己弄明白了,才有可能取舍得当,消化吸收;只有自己弄明白了,也才有可能让读者明白。

拙书出版后,在众多的评论中,其中有一点最令我们感到欣慰,那就是说我们书中艰深的内容读者尚能卒读,比较明白,听后顿时有一种愉悦,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愉悦,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力气。但这种“愉悦”瞬间即逝,其后就有一种茫然感,于是愉悦化作苦涩,真是“苦海无边”啊,不是吗?这本写完,倘继续再写,接踵而来的不还是苦吗?这真是“自讨苦吃”,但于我们,却是无怨无悔的。

当然,对于西方史学,我们也是初学,还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即要把自己的所学,尽量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播撒给大众社会,笔者早年所写的《克丽奥之路》,近年为台湾淑馨出版社所写的《影视史学》等几本小册子,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8世纪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的事例当可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他以其文情并茂、雅俗共赏的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享誉后世,他的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言,他要使他的著作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摆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

对于我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追求,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

### 三

据报纸消息称,金庸先生正在修改他的旧作;近期又有报

道,广州出版社版的《金庸作品集》即将“出世”,又说经金庸先生改写修订完毕的“改定本”《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已经推出。

我还没有看到新出的这两部书,不知道金庸先生对他的武侠小说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动干戈”,未可妄议。由此,我想到了对学术著作的旧作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对旧作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或“不悔少作”,只字不改,这以鲁迅为代表;或大动干戈,改得面目全非,这以郭沫若为代表,他的《女神》就是这样。

是耶?非耶?似乎各有其理,难以定评。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这样说:“肯定‘不悔少作’的,强调的是历史感,是文学作品独立的生命价值;而肯定反复修改的,强调的则是时代在发展,作家在进步,不断修改、提高旧作,正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表现。看来无法统一也无需统一,大千世界,五花八门,作家各行其是,岂不更好?”<sup>⑦</sup>

说得好。我认为,这一论述也适合史学史家的。对此,我是倾向于“修改派”的,只不过不是一个“彻底的”修改派,倘若大动干戈,弄得原作面目全非,那不妨重写一本书好了。我的意见是,学术著作若有重版的机会,是可以也应当作些修改的,它包括:纠正原作中的错误、修订那些表达不确的文字、作一些必要的增补等等。其因就在于“时代在发展,作家在进步”。

这里先就本书的体系及布局作一点说明: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章与余论可合为一个单元,主要是论述史学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论及了中国史学如何引入与应对西方史学的问题。第二与第三两章组成一个单元,试图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看西方史学的进步与变化,以阐明历史学家时空观念的拓展与传统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充。第四章至第六章合为一个单元,显示了从古迄今西方历史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这就深入到了传统的史学史中较少谈及但恰恰是

最核心的历史理论的问题。第七与第八两章组成一个单元，通过十位西方著名史家，论述了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与文化观念。第九与第十两章组成一单元，以年鉴学派的演变，更以二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旨在说明西方史学文化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乘第二版面世的机会，对本书作了一些必要的增补，情况如下：

“前言”是新写的，其中说到了晚近 30 年西方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的编纂方法问题以及对原作的修改问题。

在第三章，补写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这是二战后“自下而上”历史观变化的结果，也是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演变中留下的重大业绩。

在第九章，增写了释“年鉴现象”一节，以对这种文化景观作一种历史性的透析。

第十章基本上是重写的，只保留了对西方史学自古迄今经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论断，因为这是本书著者的重要识见。新写了二战后，尤其是近 30 年来西方新史学的新变化，如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史学、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内容。

余论，超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原先所没有的。顺便需要说及，“超越时空的对话”，这一标题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篇文章的题名<sup>⑧</sup>，现用作余论的标题，意在对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文化的输入及其对我国史学的影响，作一点思考，权作“结语”。

此外，还有其他零零星星的小修改，不再一一列出。增补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分量不是很多，故算不上对原作的“大动干戈”。增补的文字有不少是用了已有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倘要以现在的条件与眼光来看，本书要大修的或新写的

可能还有不少,比如赫伊津哈的文化史观念,当下就有条件写成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sup>⑨</sup>,原作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曾起过“引玉之砖”的作用,干脆就不去改它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只好“一仍其旧”了。

上海社科版与原版相比,还有一个很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增加了100多幅插图,这一幅幅图片,犹如一个个不时闪回的镜头,一下拉近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让读者在这种视觉的感氛下,去感悟历史、去感受文化,从而在这潜移默化中去提升人文素养。由此又想到,忽视影像及其所能传达的历史文化理念,而一味地依赖文字,是不足为训的。

正这么写着,忽然电话铃响了。噢,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成兄的电话,那是为了一个课题的事与我切磋,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到了我们的书,在那时曾起过“启蒙”作用。

“启蒙”作用?这真是令我们诚惶诚恐。此刻,在迷茫的思绪中,蓦然跳出了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灯塔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们继续在热烈而又永不停止地探求真理,但斯芬克斯仍然对着我们微笑不肯吐露她的秘密。<sup>⑩</sup>

是呀,为解密斯芬克斯之谜,探求历史学的真理,我们的确要继续努力,永不停止,以答谢读者,回报社会,并祈盼在新一代的读者群中,这个新版本也能继续起到一点点“启蒙”作用。其因或许是,拙书所述包含了一些西方史学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这“宗”可能是它的知识领域),并不因时而变。我们更祈盼新一代读者的批评与赐教。

至所向往!

张广智

2003年元月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 前言

### 第一章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 一、文化概念的形成及演变
- 二、文明与文化
- 三、史学与文化

### 第二章 时空观念的拓展

#### ——世界史编纂的历史考察

- 一、世界史的童年
- 二、上帝之城
- 三、走向人的世界
- 四、“世界主义”的时代
- 五、从西方文化中心论到人类文化多元论
- 六、全球观点世界史的新时代

### 第三章 研究领域的扩充

#### ——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

- 一、西方史学的源头
- 二、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创立
- 三、传统的赓继
- 四、走出传统史学的先驱者
- 五、走向历史的深处
- 六、新史学的广阔天地
- 七、把历史交还给人民
- 八、历史学的新生代

### 第四章 思想的历程(古代篇)

- 一、古典文化中的历史理论
- 二、犹太文化中的历史理论
- 三、基督教文化中的历史理论

---

## 第五章 思想的历程(近代篇)

- 一、进步观念的形成
  - 二、进步观念的发展
  - 三、历史主义的萌芽
  - 四、文化的历史主义
  - 五、历史主义的治史原则
  - 六、历史主义的发展
- 

## 第六章 思想的历程(现代篇)

- 一、批判的历史哲学
  - 二、绝对的历史主义
  - 三、“历史即思想的自我认识”
  - 四、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法国
  - 五、历史的解释
  - 六、解释模型的争论和修正
  - 七、历史的客观性
- 

## 第七章 文化的视野(上篇)

- 一、维柯:诗性智慧
  - 二、伏尔泰:“文化史之父”
  - 三、基佐:欧洲文明的阐释者
  - 四、巴克尔: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
  - 五、布克哈特:“最卓越的文化史家”
- 

## 第八章 文化的视野(下篇)

- 一、卡尔·兰普勒希特:世纪交替之际的思考
- 二、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
- 三、赫伊津哈:寻求失去的平衡
- 四、斯宾格勒:预言西方文化的命运

## 第九章 经济·社会·文明 ——年鉴学派及其史学范型

一、悠久的历史传统

二、年鉴学派的演进

三、费弗尔和布洛赫：总体史的开创者

四、布罗代尔与长时段历史理论

五、从地区史到精神状态史

六、走向世界

七、释“年鉴现象”

## 第十章 西方史学的新方向

一、五次转折

二、重新定向

三、叙事史“复兴”

四、7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

## 余论：超越时空的对话

一、更新的动力

二、土壤与种子的联想

三、关键在哪里？

## 注释

## 附录一 人名对照表

## 附录二 简要书目

## 后记

# 第一章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呈** 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意图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陈述、分析西方史学的演变。但是，什么是文化呢？或者进一步问，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史学上的“文化”概念呢？

这真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词汇像“文化”这一术语那样，曾经引起过人们如此众多的关注与争论。文化定义有多少？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合写了一本书：《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列举了从1871年至1951年这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竟有161种之多。从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时代以来，这种争论非但没有停息，而且更加频繁地在发展着，关于文化的定义，恐怕也在相应地增加吧。



克罗伯

人们也许会问，这不是一场概念之争抑或文字游戏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深入研究文化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界定文化一语的内涵与外延，探求这一术语变迁的来龙去脉，无疑将有助于文化学研究的深入。文化范畴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概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揭示某些社会对象或整个历史过程的特殊性。此外，文化的界定，还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要求，而首先是满足历史学的需要。尽管历史学的任务不是直接去铸造“文化”概念，而只是运用它，但“文化”概念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发挥作用，把文化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这是史学理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目前情况来看，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历史学在以往的文化讨论中还远未发挥其学科的全部特征，因此，我们认为，不论是史学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历史研究，都将是大有作为的。由此出发，不仅历史学家对历史将作出更为全面的与深刻的阐述；而且文化研究也对史学的学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助于它的革新与前进<sup>①</sup>。

## 一、文化概念的形成及演变

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作出自己的描述，因为，文化乃是自我的反映，“人类投影于文化中，从中认识自己；唯有这面古老镜子向人呈现他自身的面貌。”<sup>②</sup>在这方面，莫过于文化人类学家（或文化社会学家）所作出过的贡献了。鉴于本书的文化史性质，对于文化概念，我们只想作出历史的而非个人的描述，即便如此，也可能是浮光掠影的，更无意再为纷纭的“文化”定义添上一个新的界说。

文化是人的创造。人类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文化。人类的不断赓继、蕃衍、进化，也促进人类文化的积累、继承与发展。简言之，文化伴随人类而来，并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文化观念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术语也是这过程中显露与更新的。下面，我们试图陈述一下这个概念在西方自古迄今的历史演变的过程。

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文化概念的最初出现也应当追溯到它那里。当时，古希腊人对文化的理解是公民参加城邦政治与社会活动的一种能力或品质。古希腊作家所使用的“tropos”（“样式”或“方式”）、